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学术话语垄断、回应中国本土教育实践问题、彰显教育文明主体性的必由之路。本版邀请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分支学科系统建构、方法论自觉、效能检验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逻辑、建构路径与时代价值,以期助力中国教育学原创力、解释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

高 维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展开,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教育学需要立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围绕真实问题和实践创造,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知识系统。教师教育学、学前教育学、基础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分支学科,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推动其系统化建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实践、贯通育人过程、推进交叉创新。

一、立足中国教育实践,明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立场

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回答“立足何处、面向何方”的问题。分支学科是在教育实践不断发展、教育问题日益复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教育规模宏大、层次完整、类型丰富,长期积累了普及教育、促进公平、提高质量、推进课程改革和完善学校治理等经验,这些都是分支学科生长的现实土壤。

一是以价值统领把准分支学科建设的根本方向。教育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研究。无论是教师教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课程与教学研究,其核心都应指向“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离开立德树入这一价值统领,分支学科容易陷入技术化、碎片化和工具化。

二是以实践根基夯实分支学科生长的现实基础。中国教育学的理论生长点,存在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之中。我国长期形成的师范教育传统、教研制度、班级育人经验和课程改革实践,都蕴含着重要的理论资源。分支学科建设不能停留在借鉴国外理论上,而要从中国教育真实场景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形成解释。

三是以理论生成推动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概念和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不在于证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也不在于对实践经验作一般描述,而是要在经验提炼中形成核心范畴、理论命题和分析框架。只有把制度优势、治理经验和育人智慧转化为有学理支撑的表达,分支学科才能真正建立主体性。

二、强化重点分支支撑,推动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系统展开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不能停留在分支学科的平面罗列,而应推动学科发展逻辑与问题解决逻辑相贯通,在重大教育问题研究中把握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在关联。教师教育学、学前教育学、基础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学科,虽然研究对象和侧重不同,但都围绕人的发展展开,共同构成主体框架。

一是以完整育人链条统整不同阶段教育研究。教育活动贯穿人的成长全过程,不同阶段既有相对独立的任务,也有连续递进的关系。学前教育重在奠基儿童身心发展,基础教育重在夯实国民素质、促进全面发展,高等教育重在支撑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分支学科建设不能割裂这些阶段,而要揭示教育目标、内

容、方式和评价之间的衔接关系。

二是以育人关键环节贯通知识体系建设。教育目标要转化为学生发展,关键在于教师、课程、教学和评价等环节的有效运行。教师教育关注“谁来育人”,课程与教学论关注“以什么育人、如何育人”,教育评价关注育人成效及其改进。这些领域并非分散存在,而是共同构成教育实践运行机制。重点分支学科建设应加强对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内容组织、课堂教学转化和评价反馈机制的系统研究。

三是以重大问题牵引分支学科协同创新。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单一分支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学生全面发展涉及课程、教学、评价、教师发展和学校治理的协同;教育公平既关系资源配置,也关系制度设计 and 学生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既需要高等教育改革,也需要基础教育阶段的素养培育和贯通培养。分支学科建设应围绕重大问题开展协同研究,在共

同问题探究中实现协同创新。

三、布局新兴交叉领域,拓展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边界

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停留于既有框架延展,还应回应科技革命和教育形态转型。人工智能、大数据、脑科学、学习科学、数字治理等领域,正在重塑教育组织方式和人的成长环境,使教育学面临新的对象和问题形态。中国教育学要前瞻开拓新兴交叉领域,在融合中拓展知识体系边界。

一是围绕数智时代教育变革开拓新兴领域。人工智能介入教育过程,推动学习环境、教学关系、评价机制和学校组织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教育学不能仅把人工智能视为教学工具,而应研究智能条件下人的发展、知识生成、学习支持和教育公平等问题。智能教育学等新方向正推动教育研究从传统课堂和学校走向智能环境、数字空间和人机协同育人。

二是围绕人的核心素养发展推进学科融合。人的成长受到个体认知情感、社会、文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学习科学、教育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为理解学习过程、核心素养形成和社会化过程提供跨学科支持。中国教育学应坚持教育立场,吸收相关学科成果,推动教师教育学、基础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学科形成富有解释力的知识框架。

三是围绕未来教育形态重构学科边界。教育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课程形态与教师角色,倒逼学习科学重新理解“人是如何学习的”,也促使教育治理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驱动。唯有持续打破学科壁垒,在交叉地带发现新问题、形成新范畴、提出新命题,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保持生长活力。

中国教育学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建构,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程。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国教育学应推动分支学科由经验积累走向理论自觉,由局部研究走向体系建构,从相对封闭走向跨界开放,为解释中国教育实践、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计划项目“面向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师范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成果)

实践淬炼与对话互鉴：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效能的双重检验

朱文辉 马 跃

章 乐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战略任务与时代命题。在这一整体性学术工程中,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关乎学科自身话语权确立,更是直接服务于教育强国战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方法论自觉,这一方法论的自觉,核心在于坚持“两个结合”,本质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范式的系统性反思与超越,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特质的深度体认。它不能止步于用中国材料验证外国理论,亦不能满足于用中国话语包装旧有框架,而必须以“以中国为方法”为基本立场,以“扎根中国教育”为发生机制,以“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为突破方向,以“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调适与创新”为操作支点,实现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革命。

一、“以中国为方法”：从对象到方法论坐标的结构性跃迁

“以中国为方法”并非将中国简化为经验案例或实证场域,而是将中国作为理解教育现代化、知识合法性与制度演化逻辑的元问题域与方法论原点。它意味着中国教育实践所内蕴的历史连续性(如传统教化育人理念与现代素质教育理念的赓续调适)、制度嵌入性(如基础教育统筹管理体制与地方办学自主的平衡)、文化主体性(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西方“能力本位”的价值重构),不是需要被解释的“特殊现象”,而是生成普遍性教育原理的原初土壤与逻辑起点。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制度建构、实践创新,都内嵌着中国人对教育本质、育人价值的独特理解,这些扎根中国文化与制度土壤的实践经验,本身就蕴含着突破既有理论的思想动能,其所凝结的“中国逻辑”,正构成教育理学理论再概念化的本土资源。它要求我们改变以既有理论框架简单套解中国实践的研究惯性,更加重视从实践中提取范畴、从制度运行中发现机制、从教育行动中提炼原理,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往返验证中形成新的解释框架。

二、“扎根中国教育”：作为方法论意蕴的实践认识论转向

“扎根”绝非经验主义的田野采集,而是以实践为认识发生的本体论场域,展开一种本土化、关系化与过程化的认知方式。方法论意蕴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反对把鲜活教育现象抽象成通用研究变量,主张在具体时空中把握教育实践生成的本土性知识。不同区域的教育实践需要放在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交织而成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解释。二是跳出个体与制度、微观与宏观等二元对立框架,聚焦教育实践中真实的关系。任何政策落地、实践推进都不是某一主体的单向行动,而是不同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立场互动博弈的过程,关系网络的动态调适与平衡,才是真正决定政策效能和实践效果。三是不满足于静态的切片式研究,转向追踪教育实践的生成。中国教育改革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

调整的渐进过程,任何教育形态都不是预设好的结果,而是在多方主体的持续互动中逐步演化生成的,这一动态演化过程本身,就是最富张力的理论源泉。

三、探索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从“理论搬运”到“范式创生”

本土知识生产新范式,核心在于建立实践、概念、理论和政策的循环模式。一是从实践母体中淬炼原创性概念。本土原创概念不是凭空臆造的抽象语词,而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独特运行逻辑的提炼概括,其核心是跳出西方既有概念的语义框架,用符合中国制度特质、文化传统的话语,准确概括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凸显中国教育实践的独特属性。二是以中国实践为参数构建中层理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抽象建构,也区别于对个别经验的细碎总结,中层理论以中国教育实践的具体问题为导向,通过提炼核心变量、梳理变量间的关联逻辑,构建能够解释本土现象、预测本土实践发展的分析框架,为具体领域的教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三是理论成果须经由“政策实验室”验证。自主知识生产要服务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产出的理论成果需要放回真实教育场景中接受检验,通过多轮迭代优化不断调适完善,最终让理论产出直接对接政策推广与实践落地的需求。

四、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调适与创新：方法论自觉的操作化表达

方法论自觉最终落脚于具体的方法创新,中国教育学亟须发展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研究方法。一是制度民族志研究的深化。超越西方民族志偏重个体微观叙事的传统研究取向,转而聚焦政策文本、组织运作和基层执行的制度链条,深入追踪国家教育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完整过程,揭示制度落地过程中不同主体的互动逻辑与调整机制,还原中国教育制度运行的真实面貌。二是数字足迹分析的本土化。不照搬西方既有的学习分析模型与理论假设,而是立足中国教育实际,依托本土平台积累的海量教育行为数据,充分考虑中国学生的学习文化、教育制度的独特属性,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三是跨尺度的混合研究。打破不同研究尺度之间的壁垒,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不同研究有机结合,真正破解教育复杂议题的运行逻辑。这些方法创新,不是对既有方法的技术修补,而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主权在方法论层面的庄严宣告。教育学的“中国时刻”,不在理论大厦的华丽竣工,而在每一堂课、每一所学校、每一项政策中,我们能否以清醒的方法论自觉,让中国教育实践成为世界教育知识版图上不可替代的坐标原点。这既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更是文化自信的深沉回响。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中国德育课程理论的时代建构研究”成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步伐。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由此,衡量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效能,不能止于概念创生与理论提炼,还应接受实践与国际对话的“双重检验”:既要回应中国教育实践的真问题,也要在世界教育知识体系中形成应有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一、构建以问题回应为导向的实践检验框架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若要发挥效能,必须能够经受教育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国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知识必须扎根真实情境,方能彰显解释力与建构力。一是聚焦时代给出的命题,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数字化转型、城乡教育一体化等重大议题,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避免概念悬浮与现实脱节。二是回应基层领域的关切,深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等改革前沿,提炼一线经验中蕴含的规律性认识,使理论建构与政策实践同频共振。三是检视预设方案的实际效度,通过教育实验、政策评估、案例追踪等多元路径,校验教育学理论在改革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与解释边界,及时修正脱离实际的理论假设,使知识体系在与现实的反复对话中走向成熟。

二、构建以本土经验为根基的实践转化路径

中国教育实践蕴藏着丰厚的理论富矿,将其系统化、范畴化、学理化,是检验自主知识体系生命力的关键环节。一是萃取本土范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因材施教、知行合一、教学相长等思想资源,结合新时代育人实践,提炼具有标识性的教育学概念与命题。二是构建中国范畴,围绕“立德树人”“五育融合”“教育家精神”等本土话语,进行系统化学理阐释,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畴。三是激活转化机制,打通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通道,依托教育改革试验区、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等载体,推动理论成果在课堂、学校、区域多个层面落地生根,让学理建构与教育现实形成血脉相连的生成关系。

三、构建以话语创新为支点的国际对话机制

在全球学术谱系中,中国教育学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寻求从“翻

译者”向“贡献者”的转变,这需要通过高水平的国际对话进行效能验证。中国教育学若囿于自说自话,便难以在世界知识版图中占据应有位置。一是塑造标识性概念,打造一批源自中国实践、具备国际辨识度的学术术语,如“教育强国指数”“教育数字化中国方案”“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等,提升话语的可传播性与可对话性。二是搭建对话平台,依托世界教育研究学会、比较国际教育学会等国际学术组织,主动设置中国议题,推动国际教育研究议程的多元化重构。三是创新表达方式,注重学术成果的跨文化叙事,在保持学理深度的同时增强文化共情,既不简单移植西方理论框架,也不刻板复述本土经验,使中国教育学声音真正“走得进、听得懂、留得住”。

四、构建以文明互鉴为底色的知识交流格局

国际领域的教育对话不止于发声,更在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意义,在于能否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方案与启示,能否经得起“普遍性”中的“特殊价值”检验。国际对话不是简单的“讲中国故事”,而是通过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范式。一是输出方案智慧,围绕教育公平、教师专业发展、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等全球性议题,贡献基于中国实践的解决思路,如脱贫地区教育振兴经验、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智慧、推进教育数字化路径等。二是参与规则制定,积极介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多边机构主导的教育评估、教育标准、教育治理规则形塑,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朝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三是助力共同发展,依托“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合作载体,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分享教育发展经验,赋能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能力提升,培育以平等互鉴为内核的南南教育学术共同体。

五、构建以双向贯通为枢纽的效能反馈体系

实践检验与国际对话并非孤立两端,而是相互滋养、彼此印证的有机整体。健全两者之间的反馈贯通机制,方能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持续进化的动力闭环。一是构建双向校准机制,以实践效度校准国际叙事的真实性,以国际比较反观本土经验的独特性,既防范理论建构的自我封闭,也警惕盲目跟随的话语依附。二是培育复合型学术队伍,打造既深谙中国教育国情、又熟谙国际学术规范的学者群体,在田野调查与跨国研究之间锤炼学术功力,在政策咨询与国际发声之间拓展学术影响。三是完善评价激励导向,改革教育领域的学术评价体系,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贡献与赢得国际认同的对话能力共同纳入考量,破除“唯论文”“唯SSCI”倾向,引导学界面向真问题、做真学问、出真成果。

归根结底,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效能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其能否经受实践场域的反反复淬炼与国际对话的多维审视。前者夯实其本土根基,使理论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后者拓宽其世界视野,使学问真正参与文明互鉴。两重检验交织共构,方能托举一个既具中国气派、又有全球格局的教育学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与人类教育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学界的独特智慧。

(作者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